

探究刘慈欣的科幻星系——吴言访谈

本报记者 王 辉

吴言的专著《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刘慈欣星系》(以下简称《刘慈欣星系》)日前在太原市图书馆太原书院举行了新书发布会。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部刘慈欣研究专著,出自一位知性女子之手。她叫李毓玲,是我省金融行业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业余时间里,她是一位探究科幻文学的评论工作者,以吴言为笔名发表了大量作品。

访者:吴言您好,首先祝贺新书出版。作为第一部全面研究刘慈欣文学作品的评论专著,请您谈谈《刘慈欣星系》的创作缘起。

吴言:谢谢!我从2015年初开始关注刘慈欣的科幻文学,当时山西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要出一部山西15位作家的评论集,其中打头的就是刘慈欣。当时他还没有获雨果奖,在省外已经很有些影响力了,但主流的文学评论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省内没有评论家写过关于他的评论。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都是文科背景,在接受科幻方面多少有一些障碍,当时的评论委员会主任段崇轩想到我是理工科背景,所以想让我尝试着写刘慈欣的评论。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刘慈欣综论》,段老师和傅书华老师他们觉得还不错,段老师还给推荐到专业的文学评论刊物《南方文坛》上发表了。因为正好赶上评奖期,还获得了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的评论奖。此文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种子”。之后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广受各界关注,我也经常被报刊约稿写关于刘慈欣的科幻文章。到2018年底的时候,我下决心写一部关于刘慈欣的专著,也是这些年研读科幻的成果。2019年春开始写,因为是业余写作,时间比原想的拉得长,几易其稿,尝试了几种写作范式,到2020年7月才全部完成,年底正式出版,就是这部《刘慈欣星系》。起名“星系”是因为这个词有科幻感,星系有恒星、行星、小行星带、星云等,正好对应于刘慈欣作品中的代表作《三体》系列、其他长中短篇小说和文论等。可以说刘慈欣的作品体系是比较完整的,涵盖了小说的各类体裁和众多的题材。

访者:您在这本专著中对刘慈欣的长中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评析,对刘慈欣的科幻理念和创作历程进行了梳理,在您看来,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呈现出怎样一种变化?分别具有哪些特点?

吴言: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跨度有30多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十几年是准备阶段,他是一个典型的科幻迷,痴迷于阅读中外科幻作品,读多了就想自己动笔写,写过中短篇,甚至还写了两部长篇,但都没有发表或出版,直到1999年才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处女作。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是他的创作集中阶段,开始是集中创作中短篇小说,期间也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比较重要的是《超新星纪元》和《球状闪电》,前者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创作,五易其稿最终完成;2005年后他开始集中创作《三体》系列,到2010年第三部完成并出版,这段集中创作的时间正好是十年,而且都是在刘慈欣的福地娘子关电厂完成的。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是《三体》系列的传播过程,开始是在科幻迷中流行,逐渐出圈,2015年获得雨果奖后引起广泛关注。恰逢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开始流行,自媒体蓬勃发展,也助推了《三体》系列成为超级畅销书。刘慈欣把自己集中创作的那十年又划分为三个阶段

段,主要是根据关注的科幻题材来划分的:第一是“纯科幻”阶段,作品集中在科幻创意上,代表作有大艺术系列:《诗云》《梦之海》《欢乐颂》等;第二是“人与自然”阶段,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将科幻创意和现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代表作有《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球状闪电》和《三体》第一部;第三是“社会实验”阶段,焦点集中在各种人类社会的实验上,代表作有《赡养上帝》,长篇是《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当时刚写完,他想实现从第三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回归,实际上第三部纯科幻色彩也很显著,可以说写出了刘慈欣自己心目中的科幻理想之作。

访者:您的评论文章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之上,同时语言活泼,读来生动可感,请问您基于怎样的评论理念,并在这本个人专著中如何实践?

吴言: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没有学术功底和理论基础,只能从细读文本入手,就是一种读者的角度,是赏析类的、印象派的评论。正好科幻对于非科幻迷的普通读者来说,还是有些阅读障碍,对文科生尤其如此。即便我这样的理科生,理解刘慈欣作品中的科幻创意和各种机枢,也是在反复读过几遍后才能把握大部分,还不是百分百。所以说科幻的可阐释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也是想做这样一种桥梁架设的工作,让更多的读者能走近科幻,能领略到刘慈欣科幻的风格和美。出版社也是想出版一本面向市场、面向大众的评论书籍,而不是那种学院派的学术论文式的,所以是在这些考量后决定这么写的。实际上在专业的科幻评论家眼里,还是欠缺学术性的。好在经典作品需要各种解读和评论,学术性的阐述还是留给学者们去做吧。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开始我是想集中解读科幻创意。因为包括刘慈欣本人在内的科幻作家,并不希望评论者用传统的文学评论去评判科幻,因为科幻文学

是先“科幻”后“文学”。像刘慈欣这样的“硬科幻”作家,更是注重科幻创意。一部作品先有科幻创意,然后再为它找一个好故事,这样构成了科幻文学。传统的文学评论是集中在人物和故事身上,同科幻还是不贴合。后来觉得光解读科幻创意还是干巴巴的,把故事性加入后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刘慈欣作品的神韵。在写的过程中,先是写得很细,总共写了22万字,出版社倾向于“轻阅读”,后来删减到16万字。我觉得这个由丰到简的过程还是必要的,所以这部书作为导读是合适的。

访者:通过对刘慈欣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科幻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认知?

吴言: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某一种类型文学的突破总是要落到个人头上,科幻文学的突破、出圈、获奖就是靠刘慈欣来实现的,然后引发群体效应,吸引更多作者和读者。科幻文学的发展也是离不开平台的,在我国这个平台就是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培养起作者群后就着力于打造畅销书,出版长篇科幻作品,《三体》系列的诞生就得益于这样一个链条。科幻文学作为大众文学要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从文学转向影视,这个突破在我国也是由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完成的。所以把刘慈欣作为科幻文学研究样本是很全面也很有代表性的。

科幻文学作家群目前肯定有所增长,但什么时候能涌现出第二个刘慈欣,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刘慈欣这十年没有出新作品,大家都翘首以待,实际他写过几个,是对自己要求高,别人用过的科幻创意都不再用,自己的更不能重复,所以轻易不拿出手。而且获奖后事务增多,他说不影响,实际还是有影响的。这些年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影视改编上。好消息是他的新作快要问世了,大家敬请期待吧。



在《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刘慈欣星系》新书发布会上,吴言与读者分享创作心得。

读书三忌

李德平

读书是好事,但也有忌讳。下面列出三条:

一忌贪。很多读书人嗜书成癖,恨不得将天下所有书搬回家中,据为己有。作为藏书家当然可以这样做。但对于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病,因为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况且天下的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书买多了,沦为摆设,并非雅事,仅仅满足了一种占有的欲望。人生苦短、精力有限,贪多嚼不烂。近期看到一些爱好读书的朋友,自觉把自己不常用的或者视为鸡肋的书通过做公益的形式捐赠出去,既给自己的读书生涯“减负瘦身”,也帮助了更多渴望读书而由于种种原因无书可读的人,可谓一举两得。

二忌浮。读书最忌讳的是浮躁。浮躁的原因,无非是觉得自己若要获得志业上的成功,这也要掌握,那也要知晓,似乎越杂越博越好,不知不觉成为书籍的奴隶。这本还没看完,就惦记着另外一本,这册还没消化,就迫不及待打开另外一册,于是水过地皮湿或者地皮也不湿,留不下一点思想的痕迹。因为读得太快,最后读小说简化成读故事梗概,读历史简化成读人物故事,读纯散文或者诗歌永远静不下心来。有人看似读了很多书,到最后所掌握的知识精华,仅仅是口头卖弄的那点谈资,而不是深悟了其中蕴含的思想、艺术和智慧。好的阅读,应该细水长流。

三忌一味追新。现在是一个快节奏时代,读书也感染了时代病。市场上和网络上的新书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值得过段时间重新回味品读的似乎并不多见。有谁会会重新翻阅某本三年前读过的书,或者不时想起某本书上的某段话、某个人物和句子?这样的经历或许屈指可数。曾经见过某位大名鼎鼎的耄耋学者的书房,满满当当的书架上没有几本当下市场上流行或新近出版的书。我不提倡大家重新回到传统当中一味读经典,但对当下的一些新生事物,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否则蝌蚪跟着鱼儿浪,最后浪得连尾巴也没了。

“拯救”书评

聂震宁

书评写作,如今在写作界——无论是文学艺术的还是学术研究的写作界,非议多多。非议中说什么的都有,诸如红色书评、人情书评、广告书评、营销书评、雇佣书评、评奖造势书评、溜须拍马书评、赞歌浮夸式书评、恶意贬损式书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名声不是太好。而对优秀书评的褒奖、对客观真诚书评的尊重却几近寥寥。于是,在各种专业领域,对于书评写作者,相当一些专家学者不是侧目而视便是漠然视之。可是,写作界和出版界的大量出品又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把新书信息四处传扬,日趋活跃的国民阅读更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的导引和解读,线上线下的媒体也在祈望通过书评把作者、出版者和读者集合到一起,增加自己的阅读量 and 点击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边是名声不彰的处境,一边是毋庸置疑的现实需求,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书评面临的尴尬局面,于是,忽然就有了一个念头:拯救书评!

拯救书评应当从拯救书评家的精神品格做起。好的书评家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写作书评是一种职业,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个人思想的表达,可是也不能“著书都为稻粱谋”,还要有对文本负责的担当,对专业负责的使命,要有社会公益精神,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抱负。眼下书评的口碑不佳固然有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可是全怪市场也是书评家的偷懒和失职。试想,既然不愿意以良好的公益精神为社会、为专业、为读者有所担当,又何必去推介他人的著述,导引社会去阅读?

好的书评家要有思想家的精神品格,具有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做书评不仅要解读文本,更需

要判断文本的价值,洞察文本的思想意义并加以褒贬扬抑。洞察文本的过程往往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既要正视社会现实,理解社会现实,思考社会的发展,还要回顾历史,要擦亮历史的镜子,以史为鉴,以“不忘初心”的明镜,明确“继续前进”的道路,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发展规律和继续前进的方向。书评家需要以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去引导读者正确地阅读文本。

好的书评家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一直记得,在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曾经听到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恩格斯所提倡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理解,“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是追求真理的勇气,鉴古知今的洞察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李健吾的书评受到文学界人士普遍的尊重,因素多多,其中一条就是他的艺术家的勇气。李健吾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特别表现在他与巴金、卞之琳的争论上,他的名言“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解释吗?不!一千个不!”至今还让文学界人士们记忆深刻。

好的书评家还要有种种良好的精神品格,例如,与人为善却不盲从的精神品格、乐于讨论且能服从真理的精神品格等,还有不可缺少文章家的精神品格。书评文章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还要言之可读、言之有文,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也是做书评文章须臾不可忘记的吧。



2020年5月2日,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辞世,如今一周年了。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3年的金秋时节。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英语一科的成绩太不理想,虽然总成绩刚刚超过本科分数线,但还是被录取到校址位于吕梁地区离石县的“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这就是说,我虽然美其名曰考上了大学,但等待着我的这所大学,却名不副实,还仅仅只是依托于山西师范学院的一个师专班。由于学校的具体位置紧靠离石县后瓦村的缘故,校友们后来便不无自嘲与戏谑意味地把这所学校称为“后瓦大学”。我与李旦初先生最早结缘,就是在我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时候。

后来才知道,即使是这所在当时包括我们学生自己都未必瞧得起的大学(也即“师专班”),它能够诞生在偏僻的吕梁山区,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师专班”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就是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与国内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学相比较,这个“师专班”端的是太不起眼,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改写了吕梁地区的教育史。其重要的意义绝对不容低估。

就在我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即198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吕梁师范专科学校的建制。这样一来,原来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师专班”,也就正式成为一所建制内的师范专科学校。学校的首任校长,就是在原来的“师专班”担任教导主任的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说是恩师,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那个时候的先生,虽然承担着学校的主要行政工作,但在繁忙紧张的行政工作之余,却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出现在教学第一线,承担中文系的主干课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最早的粗浅了解,就直接来自于先生。又或者说,我个人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些许成绩,与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的引领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数十年时间过去,先生授课时的满口湘音与激情澎湃,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正式调入山西大学工作,由于先生已经在省城扎根多时,我更是从各方面得到先生的悉心关照。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98年,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换届之年。那个时候的先生,退休将近十年,精力充沛的他依然活跃在省城文艺界。应该是在大会正式召开之前省直会员的一次筹备会上,那次会议的主旨之一,就是提名推荐候选的作协理事名单。先生在发言时不仅专门强调应该在理事候选人的确定上重视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直接点名,要求把时任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傅书华和我,都列入到候选名单之中。至今想来,不能不成为作协理事事小,但先生那一番爱掖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

作为先生入门弟子的我,虽然没有能力全面总结先生一生的功业,但在这里还是试图做一点不自量力的勉力概括。

第一,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育家。尽管期间偶尔也会有被迫离开教育部门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说,他终其一生都把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身到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之中。从最早在晋中教育学院任教,到后来创办了吕梁地区第一所大学,再到后来调入山西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先生的一生可谓是有目共睹,桃李满天下,门生遍三晋。先生别有洞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值得后来者认真挖掘研究的。

第二,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优秀学者。且不说受教育部委托,他先后担纲主编了全国师专学校通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本教材,单从他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有不少可圈可点处。早在1980年代初学期,先生就分别有《“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性质质疑》以及《“五四”新诗流派初探》等三篇重头文章发表在那个时候在学界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对于一个置身于偏远山区的学者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先生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挑战既定学术格局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先生这些论文的生成,一方面固然与他个人非同寻常的才华脱不开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积极鼓励思想创新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果。正是以上这些文章的集中问世,奠定了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第三,先生又是一位在古体诗词尤其是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大曲家。从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先生,很快就适应了他的晚年生活。这其中,值得我们予以特别注意的,就是先生的散曲创作。或许与先生的某种天性不期然间契合的缘故,我们发现,先生的散曲创作不仅合辙押韵,完全合乎散曲的艺术规范,而且,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现实的关注。

先生虽往矣,但盖棺论定却不是我辈小子所能够承担的事情。以上挂一漏万写出的,不过是后辈学子的我,对李旦初先生的一点粗浅认识。尽管言不及义处多多,但一片拳拳之心,唯苍天可鉴。



熊树志(85岁,徐涂中学退休教师)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副刊采编中心 王辉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wh@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